

“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之前之后

——严译与新国语的呼唤

沈 国 威

Before and After “Deliberating for Weeks to Establish a Single Term”:

Yan Fu's Translations and the Call for a New National Language

SHEN Guowei

From 1896 until 1909 Yan Fu published eight translations that greatly influenced the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he created many translation loans, but his translations were still written in an old Chinese styl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at kind of influence was exert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by Yan Fu's translations. Especially it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in the period of his first translations and deals with the selection criteria of his literary style and his way of coining translation loan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history of some terms used by Yan Fu, such as jinhua, tianyan, zhimin and jixue.

キーワード：嚴復、天演論、進化、植民、日本借用語

一、引言

19世纪是西学东渐的世纪。中叶以后，除了传教士的引介的启蒙知识以外，清政府的官方翻译机构开始翻译西方工业方面的书籍，洋务运动大大地推动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传入。但是这些引介工作并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根本性的变革。甲午战败以后（1895），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新知识的引介问题；内容的多样化和渠道的复数化是世纪之交西学引介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引介内容由西艺向西政、西学的转变，引介渠道也由传教士主持的报刊向国人创办的媒体扩展；中国人开始尝试独自引入新知识，假道日本也成为一种新的选择¹⁾。新知识需要新的话语，我们姑且把这种新时代所需要的话语称之为“新国语”。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国语，至少应该具有以下特征：可以用来表述新概念、可以用来讲授新知识²⁾、书面

1) 沈国威《时代的转型与日本途径》，收王汎森等著《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经，2007年241～270页。

2) 严复说“方今欧说东渐，上自政法，下逮虫鱼，言教育者皆以必用国文为不刊之宗旨”。“严复致伍光建函”，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3册586页。

形式和口头形式具有较大的一致性、有为绝大部分国民所掌握的可能性。通过“翻译”而实现的西方新知识的容受是新国语的催化剂，因为近代以降汉语的“进化”很大一部分不是自律发展的结果。严复是最早尝试翻译西方人文科学书籍中译的汉语母语译者之一。与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启蒙史上的巨大影响相比，严复的文本及译词对新的汉语的形成有何贡献？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思想史上的各种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对翻译理论层面的问题也不作过多涉及。本文把考察范围锁定在1895~1900年前后，主要讨论严复早期，即于19世纪内完成的《天演论》《原富》这两本译著是在何种翻译环境中完成的？由此观察当时汉语容受域外新知识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严复为确立当时的读者认可的文体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至于译词，更有其“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名言以资佐证。然而，五四以后白话取代了文言，严复苦心孤诣创制的译名与其初衷相悖绝大部分都成了历史词汇。凡此种种与包括汉语不得不从日语借入新词、译词的事实在内，都需要我们从汉语本身走向近代这一视角加以讨论。

二、《天演论》之前：19世纪末的翻译环境

严复于1895年春至1896年秋将赫胥黎的两篇论文翻译成了《天演论》³⁾。初稿完成后严复屡加修订，于1898年4月以单行本的形式刊刻出版，其后风行海内。续之，严复又于1902年翻译出版了《原富》。至1909年，严复共完成了他的主要译著9部。一系列的译著奠定了严复在中国近代启蒙史上的地位。然而从语言的角度考察严复的译著时，我们应该问当严复1895年决心向中国读者介绍赫氏的进化论时，他本人或整个中国社会处于何种翻译环境（infrastructure）之中？

二、一 严复的知识准备，

出生于福建侯官乡间中医家庭的严复，14岁考取福州马尾船厂附属的船政学堂，马江学堂，时为1866年。翌年正式入学，“所习者为英文、算数、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⁴⁾。毕业后在海军供职，1875年受派赴英，1876年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肄业高等数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建筑海军炮台诸学术”⁵⁾，留英两年有余。严复于1879年毕业回国，先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烟台海军学校教习等职，1880年调任天津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教务长），1890年升任学堂总办。1900年避义和拳乱，由津赴沪，始与海军脱离关系，在海军系统学习、工作30余年。从学历、职历上看严复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但是他并没有技术方面的翻译著述传世。相反，早在英国学习期间严复就对人文科学显示了极大的兴

3) 关于严复什么时候开始翻译《天演论》，何时译了似乎还有争论。不过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严复在1895年春的文章中谈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些主要观点（《论世变之亟》1895年2月4日~5日；《原强》1895年3月4日~9日），但是《天演论》的主要译词，如“物竞、天择、天演”却没有在这时出现。《原强》中的“争自存、遗宜种”在《原强修订稿》（迟于1896.10完成）中分别发展成“物竞、天择”，并增加了“天演”一词。译词的形成应该与《天演论》的翻译同步。

4) “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1546页。

5) “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1547页。

趣⁶⁾。1895年，严复43岁，甲午海战，中国水师重创，严复“大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⁷⁾。严复的著述见于记录是从1895年3月开始的，至1898年春共有12篇⁸⁾。这些著述无疑与《天演论》的翻译有着思想、语词上的关联。例如在《原强》等早期的文章中可以找到与《天演论》相类似的叙述和相同的译词⁹⁾。这明确地显示那时严复已经为翻译做了必要的准备。严复精通英语，对所翻译的学说有着强烈的共鸣，对相关知识均有广泛的涉猎。如梁启超等评论严复是当时中国“中学西学的第一人”，同时代没有人能象严复那样深刻地理解西方的新知识。但是我们同时还必须认识到：严复的西方新知识的获得是在英语这一单一语言系统内完成的，学习过程中不存在汉语的中介，这给严复日后的翻译造成了盲区。

二、二 社会的知识准备

而整个中国社会对容受西方的新知识做了哪些准备？除了通商口岸实用性的学习以外，1860年代以后，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机构开始讲授外语（尽管主要限于英语），培养翻译人员。西方人文科学的翻译并非自严复始，丁韪良早在1864年就译出了《万国公法》，其后同文馆又有《公法便览》（1877）《富国策》（1880）《公法会通》（1880）等刊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佐治刍言》（1885）和颜永京译《心灵学》（1889）也属于人文科学的译籍。但是这些译籍没有给中国知识阶层带来应有的影响。总而言之，与严复的充分准备相反，中国社会所做的准备明显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外语知识的积累和新的知识体系的建构方面。理解进化论需要动植物学、生物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知识¹⁰⁾，仅以曾外语知识的获得而论，当时懂英语的人少，能够胜任人文学科内容翻译的人更少¹¹⁾，严复曾借友人之口对于同文馆的数种译书表示了不满¹²⁾。中国社会还不存在英语学习的环境，例如汉外词典，直至1895年前后严复着手翻译时，可资利用的英汉辞典和术语集不过以下数种而已：

1. 马礼逊：《字典》1815~1823
2. 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1844
3. 麦都思：《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847~1848
4. 合信：《医学英华字释》1858

6)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186页。

7) “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1548页。对于严复翻译的动机有很多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严复一直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心态。

8) 《严复集》第1册1~79页收录的文章作于1896年4月之前。

9) 《论世变之亟》（1895.2）中有“自由、平等”；《原强》（1895.3）中可见：自然、宗旨、群学、数学、名学、力学、质学、化学、生物、生学、心学、自由、平等、自主、原质、进化、自治、民主、理财、议院等词语。可见严复是为翻译做了准备，对该学科的发展极为关心，进行了跟踪。也许我们要问，即使没有甲午战败严复是否也会翻译《天演论》？

10) 严复说对于斯宾塞的书“读其书者，非于天地人、动植、性理、形气、名数诸学尝所从事，必不知其为何语也。”《严复集》第1册92页。

11) 例如严复在谈到1898年英语翻译的情况时说：“方今谈洋务者如林，而译手真者最不易觐。支那境内，以仆所知者言之，屈指不能尽手”。《严复集》第3集508页。

12) 严复说：“曩闻友人言，已译之书，如《谭天》、如《万国公法》、如《富国策》，皆纰谬层出，开卷即见”。“论译才之难”，《严复集》第1册90-91页。

5. 罗存德：《英华字典》1866～1869

6. 卢公明：《英华萃林韵府》1872

7. 邝其照：《字典集成》1875

以及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几个并不一定公开的术语集。关于汉外词典严复在回忆自己学习英语的经历时说¹³⁾：

尚忆三十年以往、不佞初学英文时、堂馆所颁、独有广州一种、寥落数百千言、而义不备具、浸假而有五车韵府等书、则大抵教会所编辑、取便西人之学中国文字者耳。

严复所说的《五车韵府》应该是上海19世纪60年代石印出版的马礼逊字典的一部分。严复明白地道出了出自传教士之手的英汉辞典类的编纂目的和流通情况。这种情况直至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为止，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¹⁴⁾。同时在英汉翻译的技术层面，由于当时译书采用西人口述，中士笔录的方式，没有中英双语严格对照的机会，加之英语教育不普及，学习人数、教材、翻译定式的积累上均与日本相距甚远。

二、三 新知识的媒介：汉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严复在动手翻译之前可供利用的资源并不多，严复的翻译是在近乎零起点的状态下出发的。所谓零起点是说，严复在着手翻译西书时除了外语知识和新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等社会基础的问题以外，用以移译外语的媒介“汉语”本身，也存在着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存在于三个不同的层次，即，篇章、句子、语词。篇章、句子是语言形式，即外语的语言结构及其所表达的“内容”能否置换成某种“形式”的汉语，如果能是何种形式？语词是译名，即概念对译关系的建立。外语的每一个词都需要在汉语的词汇体系中找到一个与之对应的“要素”。这种“要素”可以是词（译名），也可以是短语或一个大于短语的小句。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严复是怎样解决这三个问题的。

三、严复的实践

三、一 关于篇章的问题

如上所述，严复精通英语，对翻译内容和相关知识也有深刻的理解，但是他一旦决定将英语的文本转换成汉语的文本时，他首先要面临译文采用何种文章体裁这一语言形式的问题。赫胥黎的两篇文章，一为讲演稿，二为帮助读者理解讲演内容的导读性文章。讲演稿的内容被认为更难懂。即便如此，这种内容也是可以通过口头语言表达的，而反观汉语当时还不存在演说体。当时的情况是对于西学书“吾之士以其时

13) 《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序，1903年。

14) 由谢洪赉负责编辑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是以日本井上哲次郎的《英华字典》为底本的。而井上的辞典则是来华传教士罗存德的《英华字典》(1866～69)的日本改编增订本。井上在改订时加入了6千以上的新词。

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¹⁵⁾。所谓“说部之词”还应该包括这样一种情况：19世纪以后来华的传教士们则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用一种被称之为“浅文理”的文体翻译圣经和其他传教文书，这种文体具有口头宣讲的可能性。传教士译圣经近百年，但是“浅文理”并没有成为一种能为士大夫所接受的文章体裁；而对新国语产生重大影响的梁启超的新文体还正在酝酿之中¹⁶⁾。

严复在1896年8月之前某时致函吴汝纶，向他介绍了所译《天演论》有关内容。吴8月26日回信加以赞许。严复遂将译稿寄给吴，请他修改。吴汝纶在1897年3月9日的回信中对严复的译文提出意见，说“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意驰骋；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元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此在大著虽为小节，又已见之例言，然究不若纯用元书之为尤美”¹⁷⁾。就是说不分青红皂白的把外国的文章中国化，效果并不见得好。此点与马礼逊、罗伯聃等传教士的文化适应的主张、实践有所不同¹⁸⁾。

严复接受了吴汝纶的建议，对译文做了修改。并于1897年11月9日（旧历十月十五日）回信，说：“拙译《天演论》近已删改就绪，其参引已说多者，皆削归后案而张皇之，虽未能悉用晋唐名流翻译义例，而似较前为优”¹⁹⁾。从这些往还的信函中可知晋唐的佛经翻译是两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而这时，他们讨论的还只是一些翻译上的细节问题，并没有涉及文体，关于文体的讨论是在《天演论》的“吴序”中进行的（完成于1898年3月之前）。吴汝纶在序中具体地谈到了文体的重要性，说“近世所传西人之书（中略）惜吾国之译言者，大抵弃陋不文，不足传其义”，“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所以对那些以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出的新学西书，“有识者鄙夷而不知顾”。严复正是目睹了传教士等译书的失败，知道文体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受众层面的问题。他在《天演论》中采用了古雅的文体，即走了一条“雅驯”的路²⁰⁾。吴汝纶在序中对严复的译文极加赞赏，说“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无疑这是对严译文体的肯定。从文章的角度来看，严复是取得了成功，如鲁迅说连“吴汝纶都肯给他作序”。但是，吴汝纶在对严复的译文推崇备至的同时，又在序中说“予又惑焉。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舛驰而不相入也”²¹⁾。吴清醒地意识到了西方新学的内容、严复的译文形式、当时读者的容受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背离，这种背离势必影响新知识的普及。在使时代的读者屈就传统的文体，还是使文体适应于时代的读者这一问题上，吴汝

15) 吴汝纶《天演论》“吴序”。《严复集》第5册1317页。沈苏儒说“在他拿起《天演论》来翻译的时候，除了‘之乎者也’的古文以外，他还能有什么别的文字工具？”《论信达雅》收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942页；而黄克武则指出：当1890至1900年代，严复从事翻译工作时，在文字上主要有四种选择：一是讲究文藻华丽与对仗工整的骈文；一是科举考试用的八股文；一是从曾国藩（1811~1872）开始，上承唐宋八大家的“桐城—湘乡派古文”，或称桐城派古文；一是刘鹗（1857~1909）、李伯元（1867~1906）、吴趼人（1867~1910）等人在撰写小说时所用的白话文。《自由的所以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71页。

16) 《时务报》于1896年秋创刊，为梁提供了新文体的试验场。

17) “吴汝纶致严复书（二）”，丁酉二月初七日（1897年3月9日），《严复集》第5册1560页。

18) 内田庆市《近代における東西言語文化接触の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2001年145~164页。

19) 《严复集》第3册520页。

20) 沈国威“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对‘新名词’之反应”，《亚洲文化交流研究》第2号，2007年105~124页。

21) 《天演论》“吴序”，作于1898初夏。《严复集》第5册1317~18页。

纶说“盖将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则吾民之智淪矣”，指望大家都写桐城文，读桐城文显然是不现实的，只能期待有人想出新办法来，这也是“赫胥黎氏以人治归天演之一义也欤”²²⁾，万事都在进化中。

《天演论》脱稿前后严复开始翻译《原富》。这是一本专业性极强的书，其中使用了大量的经济学术语。《天演论》达旨式的译法显然行不通，译文也难以再现《天演论》的“铿锵”节奏了²³⁾。严复本人也极感困惑，在给吴汝纶的信中说：“《原富》拙稿，新者近又成四五册，惟文字则愈益芜蔓，殆有欲罢不能之意”²⁴⁾。1898年春天起严复陆续将《原富》的部分译稿寄给吴汝纶，并“数数致书”希望吴汝纶依然能象《天演论》那样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吴也为严复“虚怀谦挹，懃懃下问，不自满假”的态度所打动。但是吴汝纶同样对《原富》这样的专业书也是无能为力，只为译文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吴说自己“识浅，于计学尤为枵昧”，“所妄加检校者，不过字句间眇小得失”，是“愚心所识一孔之明”，仅供严复参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吴在同一封信中提到了“桐城派”姚鼐所编的古文选《古文辞类纂》。吴对此书大加推崇，说“中学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独留此书，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²⁵⁾。

严复在收到吴汝纶信后数日之内就写了回信（旧历二月七日），从吴二月廿三日（1899年4月3日）的信中看，严复似乎从吴氏推崇《古文辞类纂》感觉到吴在暗示自己的译文没有达到吴所期待的水准，即不够雅驯（严复的信不存，我们只能根据吴的回信推测严复来信的内容）。严复在回信中辩解道“行文欲求而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就是说，翻译西方的专业书不得不使用中国典籍中没有的新词，然而这些新词被视为杜撰，影响译文的雅驯，实难以两全。针对严复的误解吴在回信中解释说“某前书未能自达所见，语辄过当”，“本意谓中国书籍猥杂，多不足远行”。西学东传后，读书人无暇阅读中国古书，“世人乃欲编造俚文，以便初学。此废弃中学之渐，某所私忧而大恐者”²⁶⁾。对于严复在信中表示的困惑，吴汝纶一方面发表意见：“鄙意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但是，同时又说：“如今时鸦片馆等，此自难入文，削之似不为过。倘令为林文忠作传，则烧鸦片一事固当大书特书，但必叙明原委”。吴氏承认词语的选择应该根据内容来决定，对严复使用新词表示了理解。吴指出：“欧洲文字，与吾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人之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今不但不宜袭用中文，并亦不宜袭用佛书”。吴谦逊地说自己“不通西文，不敢意定”，推测“彼书固自有体制，或易其辞而仍用其体似亦可也。独中国诸书无可仿效耳”。吴汝纶把《天演论》吴序中的“有待论”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认为移译西方的新知识应该创造一种全新的文体。但是，六朝译佛书时，之所以能够创新文体，是因为当时“中学未衰，能者笔受，前后相望，顾其文自为一类”；而“今西书之流入吾国，适当吾文学靡敝之时”，19世纪末在西学的侵蚀下中学已是一片衰微破败的景象；加之文体的“特建新类，非大手笔不易办也”。吴汝纶把新文体创建的希望寄于严复，说：“窃谓以执事雄笔，必可自我作古”。然而仅靠严复的孤军奋战是无法挽

22) 《天演论》“吴序”，作于1898初夏。《严复集》第5册1319页。

23) 严复说：“是译与《天演论》不同，下笔之顷，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严复集》第1册101页。

24) “与吴汝纶书（二）”，《严复集》第3册522页。

25) “吴汝纶致严复书（五）”，己亥正月三十日（1898年3月11日），《严复集》第5册1563页。

26) 本节以下吴氏的议论均引自“吴汝纶致严复书（六）”，己亥二月廿三日（1899年4月3日），《严复集》第5册1564～65页。

回古文派的颓势的，在时务文体和日本新词的夹攻下，严译的命运不难预见。关于《原富》文体的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

三、二 关于句子的形式

与文体相关连的是当时的汉语有哪些可以利用的句子形式？文体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句子形式的可能性。四六骈体文要求辞藻华丽、对仗工整，译文的句型选择必然受到严格限制。而笔者在这里主要意识到的是语言类型论视角的句子结构问题。如果说1895年当时，文章体裁尚有主观选择的回旋余地，那么句子形式上这种可供选择的余地则小得多。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的问题即当时的汉语所具有的表达上的可能性。具体地说，中文与英文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句子结构不同。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指出：

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

严复的意思是：英文中的名词可以（使用关系代词的形式）随时（从后面跟进）进行解释，就如同汉语的夹注一样，所以西文的句子动辄数十个词²⁷⁾。而汉语则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句子形式。如果省略这些修饰成分，又怕翻译得不完全。对于这段话应该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加以解读。语言类型学的知识告诉我们：绝大多数SVO型的语言，修饰成分在被修饰成分的右侧（即后面）。这样，句子中的任何一个被修饰成分都可以通过关系代词导入修饰成分，在记忆负担允许的情况下句子可以无限延长。但是，同样作为SVO型语言的汉语则不具备这种结构上的可能性。当时汉语的名词修饰结构，即定语形式极不发达（结构助词“的”被用于正式的文章是五四前后的事）。严复的《天演论》很大一部分使用四六骈文体，句子短小。这一点极不利于对概念的严格定义²⁸⁾。严复对概念的界说是很关心的，但是在《天演论》里定义文体没有得到解决。至《原富》严复放弃了四六骈体文，使用了古散文体。严复的句子形式最终限制了新词的使用。

当时汉语的另一个“缺点”是，动词、形容词等谓词无法或不具备转变成体词的手段。如原文中的“possibility可能性、personality人格、exactness准确性、variety多样化、duration持久性”等²⁹⁾。

三、三 关于语词的问题

词是语言的基本意义单位。近代词汇体系的形成需要与外语建立一一对译的关系，即一个词既是其所在语言词汇体系的一员，同时又必须是其他语言的一个等价物。现今的世界要求我们必须用不同的“形式（语音）”表达相同的“内容（概念）”。但是，在1896年汉外词典还无法满足类似《天演论》这样的人文学

27) 关于这段话笔者与翻译研究家的解释有所不同。笔者基本上认为，严复的“信达雅”与其说是一个永恒的翻译论的命题，毋宁是1895年《天演论》翻译的“个案”。

28) 汉语翻译其他语文时也遇到了定语的问题，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刑法志》。参见沈国威“黄遵宪《日本国志》的编码与解码”，《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40辑，2007年125~155页。现代汉语的定语修饰功能有了改善，如使用介词“对”将宾语提前，用代动词“进行、加以”等使宾语可接受较长大的修饰成分等。

29) 关于汉语欧化文体的研究，有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师范学院编著《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年等。但是未论及定语修饰问题。

科书籍翻译的需要；就学术用语而言中英的语词之间尚没有建立一一对应的翻译关系。无译名即无译事，例如要翻译赫胥黎的这两篇论文首先要为本文末附录中的英语原词准备译词。严复的翻译就是这样不得不从译名的创制开始，这一点与日本兰学家的早期翻译环境颇为相似（1774年刊行的《解体新书》与《天演论》一样也是一个不完整的节译）。严复说《天演论》是“题曰达旨、不云笔译”。言自己所欲言的“取便发挥”是一个原因，没有译名无法一一对译或是更主要的原因。由于没有译词“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的“失真”也就不能免了。严复在自己的翻译活动告一段落之后的1911年，谈到译名的重要性时说：“今夫名词者，译事之权舆也，而亦为之归宿。言之必有物也，术之必有涂也，非是且靡所托始焉，故曰权舆。识之其必有兆也，指之其必有槩也，否则随以亡焉，故曰归宿”³⁰⁾。这是严复翻译工作的总结。

而所谓一一对译关系的建立，就是在两个词汇系统中寻找意义上的等价物，并使之形成固定的联系，即“定译”。等价物不存在时就需要利用既有的语言成分创制。20世纪初中英概念等价物，即译名的获得不外以下有3条途径，即：（一）使用既有词语；（二）新造；（三）借自日本。这里分别存在怎样利用、承袭中国的古典词和汉译西书中已经存在的译词、这种利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怎样新创？严复以及中国读者对于借用日语词的态度、日语资源利用的可能性如何？等问题³¹⁾。

（一）使用既有词语作译词

中国的典籍和传教士出版的译籍、报刊是为严复提供译词的主要资源。前者如《天演论》中的：天道、变化、递嬗、循环……等；《原富》中作为术语使用的既有词，包括文言词和口语词更是大量增加：祭酒、佣工、交易、租赋……。使用自语言的成分移译外语是翻译的根本，就是说使用既有词语作译词是势所必然。而同时，传教士系统的译词也大量出现在严复早期的两本译著中，如：自然、宗旨、数学、力学、化学、生物、动物、植物、自由、平等、自主、原质、自治、民主、理财、几何、议院、权利、共和、民主、温带、上帝、世界、保险、银行等。严复并不看好传教士的翻译，但是1895年前后，传教士参与其间的译著及其媒体仍是引入西方新知识的主要途径，其译词的影响力也是可观的。从严复的使用可以反证这些译词的普及程度。

然而这些既有词语，不管是中国典籍上存在的，还是传教士们创制的，都有一个作为译词是否适当的问题。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新理踵出，名目繁多，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在这里严复以“prolegomena= 厄言、悬谈、悬疏、导言”为例，抱怨“此以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严复选定一个译名时考虑了许多因素，如，厄言滥恶，悬谈沿袭释氏，都不是适当的译名。造成译名不适当的主要原因是“大抵取译西学名义，最患其理想本为中国所无，或有之而为译者所未经见”³²⁾。这里的“理想”即idea，今译“概念”，对于那些“本为中国所无”的西方“理想”，严复的工作是导入新概念并使之词汇化（详后）；问题是那些“或有之而为译者所未经见”的“名义”。不同的语言之间可以建立对译关系是以人类具有可以互相接受的意义体系为前提的，而作为进一步的思考：

30) 《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序，1911年，《严复集》第2册277页。

31) 从翻译理论的角度说，严复还必须考虑：中外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概念体系；相同的指示物在不同的语言中能否唤起相同的概念；概念与“所指”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机制等问题。在此不深入展开。

32) “尊疑先生覆简”，新民丛报1902年第12期，《严复集》第3册518页。

人类是否分享一个意义世界的“原风景”？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只需努力把“未经见”的名义找出来就行了。严复也确实为了这种寻找做出了努力。需要注意的是严复在这里其实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对于一般的名义，“但求名之可言。而人有以喻足矣”，又说“若既已得之。则自有法想。在己能达。在人能喻。足矣”；但是对于那些关键词，严复则说：“盖翻艰大名义，常须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而思之，又当广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后回观中文，考其相类，则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离”。例如对于right译“权利”，严复说：

惟独Rights一字，仆前三年，始读西国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后因偶披《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恍然知此职字，即rights的译。然苦其名义与Duty相混，难以通用，即亦置之。（中略）而以直字翻rights尤为铁案不可动也。（中略）此rights字，西文亦有直义，故几何直线谓之right line，直角谓right angle，可知中西申义正同。此以直而通职，彼以物象之正者，通民生之所应享，可谓天经地义，至正大中，岂若权利之近于力征经营，而本非其所固有者乎？（中略）至Obligation之为义务，（仆旧译作民义与前民直相配）。Dut（原文如此）之为责任，吾无间然也³³⁾。

在《群学肄言》的“译余赘语”中则说：

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何以言之？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部勒【东学称组织】祈向者，曰社会。而字书曰：邑，人聚会之称也。从口，有区域也，从？，有法度也。西学国之界说曰：有土地之区域，而其民任战守者曰国。而字书曰：国，古文或，从一，地也，从口，以戈守之。观此可知中西字义之冥合矣³⁴⁾。

解释得已经非常牵强了。不同语言使用者可以有相同的概念，但不必也不可能有相同的命名理据。因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语言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严复并不赞成“西学中源说”，但是他似乎认为通过“发明”可以使隐微的中西之间的意义关系再次凸现出来³⁵⁾。

还有一种情况是除去后来添加在词语上的“杂质”。例如严复强调“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然此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自繇之义，始不过谓自主而无罣碍者，乃今为放肆、

33) “尊疑先生覆简”，新民丛报1902年第12期，《严复集》第3册519页。

34) 《严复集》第1册126页。

35) 这种方法在严复研究中被称为“格义”与“会通”。韩江洪指出：所谓“格义”，是指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术语、概念解释和比附西学中的术语和概念，（中略）

用中国传统思想的概念或观念，在案语或序言里进一步解释译文中的西学概念或观念，这种做法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会通”。“格义”和“会通”的区别在于，前者发生于英汉语言之间，目的是要了解西学本意；后者发生于汉语之内，在翻译过来的西学概念或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概念或观念之间作类比解释，重在中西学术的贯通。在严复看来，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有共同的义理，可以相互沟通和发明。（《严复话语系统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上海译文社2006年163、165页）

为淫铁、为不法、为无礼，一及其名，恶义垒集，而为主其说者之诟病乎！”³⁶⁾。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严复认为是“名义一经俗用，久辄失真”³⁷⁾。为了除去杂质，返还本义，严复选择了“自繇”这一词形。严复解释道：

由、繇二字，古相通假。今此译遇自繇字，皆作自繇，不作自由者，非以为古也。视其字依西文规例，本一玄名，非虚乃实，写为自繇，欲略示区别而已³⁸⁾。

就是说“自繇”可以与当时使用的“自由”相区别，避免后起意义的混入。选择古僻字作译词可以说是严复翻译的一个特点，《原富》中很多西方的物产名称使用了极为古僻的字。由于印刷上的限制，仅举以下数例。

译词	原词	严复的原注 引自严译名著丛刊《原富》
𪔐𪔐	bread	《广韵》：𪔐𪔐谓之𪔐。《方言》：凡以火干五谷之类，关西陇冀以往谓之𪔐，秦晋之间或谓之𪔐，𪔐与𪔐同。郑注：逆人云，𪔐者于𪔐室𪔐干之。此与西人之作馒头同事，且其名与西音甚近，今取以名之焉。67页
𪔐𪔐	butcher's meat	《说文》：𪔐，脯也。《南史》，孔靖饮宋高祖无？，取伏鸡卵为肴。又，《说文》：𪔐，𪔐，肉也。《周官》膳夫，郑注：膳，牲肉也。今取以译屠肆诸肉之字。67页
𪔐	butter	俗呼牛奶油。205页
𪔐𪔐	cheese	俗呼牛奶饼。205页
𪔐	fleece	Φ（=无注，下同）
𪔐𪔐	dairy	Φ
𪔐	woolen coat	Φ

表中的西方独特的物产名称很难包括联想义在内完全移译到汉语中来，严复试图用古僻字来翻译。但是如上表所示，有些古僻字即使古文字知识丰富的读者也无法从字面上了解译者所意图的意义，注释是不可缺少的。对其中的一些词，严复加了注释，而更多的没有加³⁹⁾。用既有字词对译外语，难免有隔阂，会影响西方概念的准确理解，即所谓“误读”的发生⁴⁰⁾。那么到哪里去搜寻适当的译名？严复在《天演论译言例》中说“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所谓“达”就是西方意义的完整的移译。用古僻字作译词可以看作“借形词”的一种⁴¹⁾，这是严复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既有词语附着义造成的误解所作的努力。

各语言的词语是自成体系的，处于不同词汇体系中的词语的分布，即原词在原文中可以出现的语境与译词在目标语言中的语境不可能完全相等。这一点似乎使严复非常困惑，说⁴²⁾：

36) 《严复集》第1册132~133页。

37) 《严复集》第1册133页。

38) 《严复集》第1册133页。

39) 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严译名著丛刊》时加了大量注释帮助读者理解。见该丛刊前言。

40) 前引韩江洪143-168页。尤其是时代的关键词“误读”带来的问题是深刻的。

41) 沈国威“译词与借词——重读胡以鲁‘论译名’”，《或问》第9号，2005年103~112页。

42) 《严复集》第2册238~239页。

宪法西文曰Constitution，此为悬意名物字，由云谓字Constitute而来。其义本为建立合成之事，故不独国家可以言之，即一切动植物体，乃至局社官司，凡有体段形干可言者，皆有Constitution。今译文宪法二字，可用于国家之法制，至于官司局社尚可用之，独至人身草木，言其形干，必不能犹称宪法。以此推勘，即见原译此名，不为精审。

即原文的Constitution作为动词Constitute的（抽象）名词形式可以出现在“人身草木”的语境中，而译词“宪法”没有与之相通的动词形式，只能用于“国家之法制”的语境。

（二）新造

既有词语不够只能新造。对于西方的新概念，张之洞等认为除了制造业以外不应新造，而应该使用中国典籍里的词⁴³⁾。严复深知全部用既有词语翻译西方书籍几近不可能。在“索之中文，渺不可得”时“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了。当然这里的“定名”可以理解为利用既有字词，或新创复合词。事实上，严复并不反对新造译名，也不隐瞒新造词。他不无骄傲地说：“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其实如上所述，有些词严复在1895年的文章中已经开始使用了。译名的创制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严复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是对于如何造，则多语焉不详。我们只能从严译中窥探严复在新造译名方面的作为。

严复说：“所有翻译名义，应分译、不译两种：译者谓译其义，不译者则但传其音”⁴⁴⁾。“译”即用已有的、或新造的词语移译外语的词义；“不译”只传外语的语音形式，而形式与内容不发生关联，即现在常说的音译词⁴⁵⁾。有一些词不需要形式与内容发生关联，如人名、地名、国名等专有名词；而另外一些普通名词则需要使形式与内容发生关联，在天演论中严复是这样做的：

译词	原词	今译	严复的说明
涅伏	nerve	神经	俗曰脑气筋
迷卢	mile	英里	Φ
乌托邦	utopia	乌托邦	乌托邦者，犹言无是国也，仅为涉想所存而已。
吉贲	gibbon	长臂猿	Φ
倭兰	orang-oytang	猩猩	Φ
戈栗拉	gorilla	大猩猩	Φ
青明子	chimpanzee	黑猩猩	Φ
芝不拉	zebra	斑马	Φ
斐洛苏非	philosophy	哲学	译言爱智。

严复为何“不译”？佛经翻译中的“五不翻”原则，即“一秘密故、二含多义故、三此无故、四顺古

43) 沈国威“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对‘新名词’之反应”，《亚洲文化交流研究》第2号，2007年105~124页。

44) “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严复集》第1册128页。

45) 沈国威“译词与借词——重读胡以鲁‘论译名’”，《或问》第9号，2005年103~112页。

故、五生善故”可以说是主要原因⁴⁶⁾。例如，在bank译“银行”已经完全普及的当时，严复在《原富》中使用了“版克”。严复说：

版克此云银号，又曰票号、曰兑局、曰钱店，其实皆版克也。所不当云银号者，以其业不仅银；所不当云钞局者，以其事之异古。而票号诸名又嫌不典，不若直译其音之为当也。（85页）

《原富》中音译词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这反映了严复对原词意义的严格追求，同时也造成了理解上的障碍⁴⁷⁾。笔者曾指出，音译词可以使词义最大限度地接近原词，但是意义的获得、定型需要较长的时间⁴⁸⁾。因为音译词不具备“理据”。严复有音义结合的意图，如bread译作赳赳，严复的一个理由是“其名与西音甚近”。

“译”的词的新造主要有两个方法，即直译和意译。但是这两个概念常被用于讨论句子层次的翻译问题，在此“摹借法”与“汲义法”称之。前者先将原词分解到语素的层次，然后再挑选与之相对应的汉语语素合为新词；后者则将原词融会贯通，用汉语的新词表达其义。一般说来，单纯词使用汲义法的较多，复合词和那些可以词根分解的词使用摹借法。上述“物竞、天择”等都是汲义法的新词；“人择Artificial selection”等则是“摹借法”的造词。严复精通英语，对涉及语源的拉丁语等也有一定的知识，在讨论一个译名是否恰当时，严复经常进行语源上的分析。例如“宪法、群学、计学”等。摹借法因为有借的因素在其中，在造词上比汲义法要容易。但是思维方式（即理据）是外语的，如将greater year译成“大年”，在未加任何解释时显然无法传递原词的意义内涵。《原富》中摹借法增加较多，如：德行学moral philosophy、内籀induction、外籀deduction、过庶overpopulation、过富overproduction、还税drawbacks、自由齐民freeman、元学ontology等；原文的复合词、词组更是全数以摹借法造出，如：分功division of labour、生货raw material、熟货manufactured good、懋迁易中medium of exchange、物值通量standard of value、真值real price or price in labour、易权power of exchange、平价average price、法偿legal tender、金铤gold bar、银铤silver bar、格物硕士great scientist等。严复创造的“计学”是一个兼有“摹借”与“汲义”性质的译词，对此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

（三）借自日本——以“殖民”“天演”为例

严复译《天演论》的1895~96年日本已经逐渐显露出成为新知识摄取源泉的端倪。除了传教士的媒体以外，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的完成，《时务报》的日文报纸翻译专栏“东文报译”等都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世纪之交引介西学时，日本译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严复的译名受到了日本译名的严重挑战。日本译名的闯入造成了“名异而实同”的问题，即存在着中日用不同的词去翻译同一个外语原词，这样就有一个孰优孰劣的判断。对于日本译名，严复大致的观点是：日本不是汉语的母语

46) “翻译名义序”，《四部丛刊、翻译名义集》。

47) 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说：“又全书翻音不译义之字，须依来教，作一备检，方便来学”。《严复集》第3册537页。可知出版社对严复的音译词提出了修改的要求。

48) 参见注45所引沈国威论文。

国家，先译成日语再转译到汉语，重译隔阂，不能传真，无法正确地表达原义；或者由于不见中国的经典，不够雅驯。例如，严复说：“东学以一民而对于社会者称简人，社会有社会之天职，简人有简人之天职。或谓简人名义不经见，可知中国言治之偏于国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然仆观太史公言《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谓小己，即简人也”⁴⁹⁾。既然如此，“不经见”的日本译词“简人”就要逊于司马迁的“小己”了。

但是日本译名并没有形态上的特征，很多日本译名作为“不可阑入之字”混进了译文。例如，“起点”是守旧人士反应激烈的日语词，却被严复不经意地用于《天演论》（论五、天刑的按语）中了。《天演论》《原富》中日本译名的情况如何？在此我们就“进化”和“殖民”做一些讨论。

众所周知，evolution译为“天演”是严复首创。但是，这一风靡一时的译词其后为来自日语的“进化”所取代。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天演论》中已经多次使用了“进化”。

“进化”是向日本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加藤弘之的造词，最早见于加藤主持的东京大学的学术杂志《学艺志林》。该杂志第10册（1878）上刊有一篇学生的翻译论文“宗教理学不相矛盾”，其中有“进化”的用例，同时使用的还有“化醇”，因为进化总是意味着向更完善、复杂的形式变化。“进化”其后被收入《哲学字汇》（1881），成为哲学术语普及开来。

在中国最早见诸文字的“进化”是时务报，1897年1月13日（光绪22年12月11日）出版的第17册上登有译自日本《朝日新闻》的社论“社会の容量（论社会的宽容——笔者译）”。古城贞吉译为“论社会”，这样一篇论述急速发展后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宽容的文章成了鼓吹进化，否定退化的文字。下面是文章的主要段落：

野蛮之地。无社会者焉。及文明渐开微露萌蘖。久之遂成一社会。（中略）抑社会二字。本非我国古来惯用之熟语。而社会之实形。自古已有。我邦建国。本自有一种俗尚。及通交於朝鲜中国。或为儒道薰陶。或为佛教铸冶。而浸润其风气。盖亦不鲜也。至近古与欧美相交。又大有变化。盖变化者。进化於善也。闻学人之言曰。生物之成育。本非有进境。惟有变境耳。然进境实在变境之中。则社会之进化於善。亦当常求之於变化之中也。变化愈多。而进境亦必多。（中略）虽然变化未必悉进化於善也。有退化於不善者。（中略）若在隆兴之运。则其第一变化。必有一进化之力。然在亡国之运者。则每一变化。又未尝不一退化於不善也。如彼朝鲜。惜亦在此否运之中。於是乎汉城之变化。每变必退化於不善。

这里的“进化”与“开化、进步”同义。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演论》的“进化”。

1. 最后第五书，乃考道德之本源，明政教之条贯，而以保种进化之公例要术终焉。（导言一、复案）
2. 此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而知徒高睨大谈于夷夏轩輊之间者，为深无益于事实也。（导言三，复案）
3. 由是而推之，凡人生保身保种，合群进化之事，凡所当为，皆有其自然者为之阴驱而潜率，（导言五，复案）

49) 《严复集》第1册126页。

4. 天演之所以陶钧民生，与民生之自为体合（物自变其形，能以合所遇之境，天演家谓之体合）。体合者，进化之秘机也。（导言十五，复案）

这4条是严复加的按语，不属于翻译的范畴，“进化”也可不作译词看待。“进化”主要在讨论“群”，即社会问题的语境使用⁵⁰⁾。在《原强》中有（游牧民族）“虽然强矣，而未进夫化也。若夫中国之民，则进夫化矣，而文胜之国也”的文字。在《救亡决论》（1895.5）中又有“必为我自由，而后有以厚生进化”的句子。例子中的“进化”与“治化将开”同义是人类，或社会文明化的意思。严复的这种人类“向化”的观点来自斯宾塞尔，严复说“其书…宗天演之术，以阐人伦治化之事”⁵¹⁾，又说游牧民族等的征服，“强矣，而未进夫化也。”⁵²⁾”下面的译例都反映了严复对“化”的把握：

6. 夫以人事抗天行，其势固常有所屈也。屈则治化不进，而民生以凋，（导言八、乌托邦）
7. 盖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含生之伦，莫不孳乳，乐牝牡之合，而保爱所出者，此无化与有化之民所同也。方其治之未进也，则死于水旱者有之，死于饥寒者有之；（导言九、汰藩）
8. 天良生于善相感，其端孕于至微，而效终于极巨，此之谓治化。治化者，天演之事也。（导言十四、恕败）
9. 前论谓治化进则物竞不行，固矣。（导言十六、进微）
10. 是故人治天演，其事与动植不同。（导言十六、进微）
11. 治化愈浅，则天行之威愈烈。惟治化进，而后天行之威损。（论十六、群治）
12. 坐不知人治天行二者之绝非同物而已。（论十七，进化）
13. 然溯太古以迄今兹，人治进程，皆以此所胜之多寡为殿最。（论十七，进化）
14. 是故善观化者，见大块之内，人皆有可通之方，通之愈宏，吾治愈进，而人类乃愈亨（论十七，进化）
15. 然则言化者，谓世运必日亨，人道必止至善，亦有不必然者矣。（论十七，进化）
16. 前言园夫之治园，有二事焉：一曰设其宜境，以遂群生；二曰芸其恶种，使善者传。自人治而言之，则前者为保民养民之事，后者为善群进化之事。善群进化，园夫之术必不可行，故不可以力致。（导言十八、新反）

《天演论》的论十七题目为“进化”，在原著中是讨论“进化论和伦理观”的部分，内容涉及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的不同之处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严复的“治”“化”“进化”的用例也主要集中在这一部分。上述例句中的“治”“化”与原文中的civilized, civilization, ethics process等相对应。由此可知，严复的“进化”是从“治化”“人治”发展而来，与“天行”这一自然界的演化相对，反映了赫氏原著的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前进的思想。严复倾向于用“天演”译evolution，以自然界为对象；用“进化”译civilization, ethics process以人类社会为对象。

50) 例1的第五书即The Principles of Ethics，今译《伦理学原理》。可知严复试图用“道德”来表示ethics的意义。

51) 《严复集》第1册16页。

52) 《严复集》第1册10页。

从词的理据上看，“天演”表达的是生物在自然界的變化，而“进化”（包括“退化”）则给这种变化加上了一个“西方”的价值视角，即单方向的进步观：“以人为论，由孩提以至<长>大成人。以国为论，由野蛮以至于开化”；人类社会是“由初民而野蛮，由野蛮而开化也”，这就是“一国一群之进化”⁵³⁾。由于“天演”一词本身没有方向性的含义，为了表达“天演”具体情况，严复使用了“浅演、初级浅演社会”“深演、深演国家”等术语⁵⁴⁾。严复在1913年发表的《天演进化论》中写道：

天演西名“义和禄尚”，最先用于斯宾塞，（中略）有达尔文所发明之二例：其一即天择，所谓各传衍最宜者存；其二则先世所习传为种业。至今学者于第一例翕然承认，以此为天演最要功能，一切进化皆由于此。

文章中严复以妇女、宗教等为例，讨论了“人群社会之进化”的问题。严复的“人群社会”是同义反复，但是“天演进化”却不可以简单地当作同义反复，其用法反映了严复对“义和禄尚”的理解，或具有深刻的思想史上的内涵。总之严复的“天演”“进化”应该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加以整理，而我们在这里可以做出的结论是：《天演论》等早期译著中的“进化”与日语并无直接关系。

另一个词是“殖民”。赫胥黎的原著是讨论生物进化和殖民地伦理的文章，“殖民”可以说是一个关键词。但是《天演论》不见“殖民”一词。

“殖民”是荷兰语 *volkplanting*（当时的正字法）的直译（摹借法），最早介绍西方关于殖民概念的是本木良永，他在《阿兰陀地球图说》（1772）中写道，美洲新大陆发现以后欧洲人“全地球ノ国土豊饒ノ国々ニホルコ プランティギンノ術ヲ建テシ也”（建立向全地球国丰饶之国家殖民之策略＝笔者译），本木良永把这种政策解释为“人民蕃育ノ術”。而“殖民”这一形式首见志筑忠雄的《锁国论》（1801），该书使用的是动词形式“殖民し”，并对此加以注释“人を植ること彼等が国の習なり、人を其地に渡し住しむるといへり”（植人是彼国习俗。乃使人住往他国之谓＝笔者译）。其后的兰学书相继介绍了殖民的概念，例如，《和兰通舶》（1805）的“衆ヲ植ル”，《坤輿图识》（1845）的“人種を移す”等。最终在《坤輿图识增补》（1846-47）上首次出现了名词性汉字熟语形式的“殖民”。深受兰学译词影响的《英和对译袖珍辞典》（1862）将“殖民”改为“殖民”，意欲突出“繁殖”的意思。“殖民”于1897年前后通过《时务报》的“东文报译”传入我国，但是，日本在大正时期（1911-25）出于与原词对应的考虑又将“殖民”改回“植民”，这一改动遂造成了现代中日语之间（包括日韩）的词形不一致⁵⁵⁾。赫胥黎的两篇文章中，社会进化和殖民地伦理是主要内容，“殖民”是关键词，是新概念。同时还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严复没有为这两篇论文的另一个关键词 *ethics* 准备固定的译词⁵⁶⁾。但是《天演论》中并没有作为重要概念导入（只提到了“移

53) 《严复集》第1册91~92页。

54) “政治讲义”，《严复集》第5册。

55) 松下国际财团研究成果报告书“欧化国家を目指せ：情報発信基地としての19世紀日本——日本新聞の中国語訳を通じて見る近代日中語彙交流”，沈国威等，1998年。

56) 罗志田指出：“严复在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成《天演论》时，已对原著进行了删节，赫胥黎主张以人伦准则约束人的自然发展这一重要观念就已被严复大量删去。”《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238页。

民新壤”)，也没有为此准备固定的译词。《原富》丁部篇七“论外属”附加说明：亦译殖民地，这是严复在自己的译著中正式使用“殖民”一词。此时，中国为列强瓜分，殖民地化刺激了国民的危机意识，来自日语的“殖民”成了必不可少的时代关键词。

《天演论》中日本译名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而对于《原富》则有必要认真分析，其中“殖民、宗教、自由、科学、哲学”等的使用都是受日本译名影响的例子。

四、《天演论》《原富》之后——新国语的呼唤

如上所述，《天演论》刊行前后严复已开始着手翻译《原富》了。1902年《原富》前二编由上海南洋公学出版后，梁启超立即在《新民丛报》上撰文介绍。梁的文章谈到了两点，即译词与文体。对于译词，梁说“至其审定各种名词，按诸古义，达诸今理，往往精当不易，后有续译斯学之书者，皆不可不遵而用之也”。同时希望严复能“将所译之各名词，列一华英对照表，使读者可因以参照原书，而后之踵译者，亦得按图索骥，率而遵之，免参差以混耳目也”。但是，译名“计学”却引发了一场争论。

严复译《原富》时，“经济学”作为译词在日本已经普及、定型。在严复的《原富》之前中国已经有经济学方面的译籍了，如同文馆的《富国策》(1880)等。当时最一般的译词是“理财”。严复在1895年的文章中就使用了“理财”来指称经济学。如“西洋言理财讲群学者”⁵⁷⁾，“西洋最要之理财一学”⁵⁸⁾；在《西学门径功用》等文章中也使用了“理财”⁵⁹⁾。但是，严复显然对“理财”不满意，试图创制一个新的译名。1898年春严复将完成的《原富》稿一册寄给吴汝纶，请他修改。这时使用的术语是“计学”。吴汝纶在回信中说“计学名义至雅训，又得实，吾无间然”⁶⁰⁾。可知严复在信中说明了所以名之为“计学”的理由，并就此征求了吴的意见。

《原富》译了后，严复在卷头说：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陋，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故《原富》者，计学之书也⁶¹⁾。

即严复认为用经邦济国的缩略形式“经济”译Economy“太廓”，而“理财”又“过陋”，所以新造了“计学”。“计”字出现在“会计、计相、国计、家计”等组合中，与希腊语的原义相吻合。“正名定义之事，非亲治其学通澈首尾者，其甘苦必未由共知”，Economy译为“计学”是严复对这门学问融会贯通的结果。

57)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26页。

58)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48页。

59) 《严复集》第1册65页(1898-1-27~24)《严复集》第1册95页(1898-9-22~23)。

60) 《严复集》第5册1562页。本文写于1898年3月20日。

61) 《严复集》第1册97页。本文写于1901年9月。

译名“计学”的成立有摹借法（直译）的因素（即从词源上分解了原词：叶科，此言家。诺密，……此言治），但是更主要的是汲义（意译）。

《原富》出版后，梁启超著文介绍，其中对Political Economy的译名发表了意见，梁说：英文的Political Economy中国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语；日本人译为“经济学”，实际上不确切。严复想使用“计学”来翻译，但是同样不能概括原词的意义。所以提出一个新的译名：“政术理财学”与大家商榷⁶²⁾。

梁的“政术理财学”一出，就在《新民丛报》上引起了讨论。读者“东京爱读生”来信说：把英文的Political Economy译为“政术理财学”比日本的“经济学”，严复的“计学”都更精确，但是，使用四个字，未免太长，在进一步构成复合词时很不方便。如日本的书籍中有所谓的“经济界、经济社会、经济问题”等词，使用“计”字不通，“政术理财”也不通。这门学问在中国虽然没有专门的研究，但是，这是人类社会必需的，中国有数千年文明，古籍之中怎么会没有一个名词来表示这门学问呢？东京爱读生希望杂志编辑部全力寻找，找出一个“雅驯之名”⁶³⁾。

梁启超在回复中承认“政术理财学”确实冗长，不适于构成新的复合词。但是在古典中寻找合适的译名也不易实现。梁指出，《洪范》有“食货”二字，与经济学的内容很相近，但是“食货”只有“客体”没有“主体”，无法让人满意。《管子》有《轻重》篇，内容是讲经济学的道理，如果要在古典中寻找译名，“轻重”二字是最合适的。但是词义不通，容易引起混乱。《论语》中有“货殖”一词，司马迁写过《货殖列传》。这个词的意思与经济学也很相近。但是Political Economy的意义注重公共的财富，“货殖”却强调私有的财富，而且没有政治的含义。《史记》中另有《平准书》，内容是朝廷理财的事情。汉代平准制度的目的是吸取天下的财富集中于京师，这本来不是为了社会全体利益的制度，不足以表达Political Economy的意义。但是单说“平准”二字，仍然有为民均利的意思；而且这二字出于《史记》，人们一见就知道它的含义，又不至于和其他名词相混淆。所以Political Economy可以译为“平准学”。这样日本的经济家、经济学者、经济界，经济社会、经济问题就可以分别译为平准家、平准学者、平准界、平准社会、平准问题。创造新的复合词也不困难⁶⁴⁾。

这时严复给《新民丛报》写信对梁启超书评中的观点做了回应。严复说，现在的英语里经济学的原词多用Economics，已经删除了Political。严复的意思是所谓“政术”云云可以不必考虑。严复指出：中国古代有计相、计偕等词，国计、家计、生计等名词也很通行。要想创制一个译名，意义的范围和深度都需要与原词相符合。如果是这样的话，“计”是唯一的选择。经济学的道理发生于日常生活，成为专门学科是近二百年的事情。经济学的一些道理虽然中国古时也有，但是中国没有这种专门的学问，这是无庸讳言的。有人说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经济学是人类社会必需的学问，古籍中一定会有专门的名称。但是我认为在古籍中找不到专门名称的可能不止经济学一科。梁启超提出用“平准”代替“计学”，但是“平准”绝不能完全表达这门学问的含义。“平准”原来是一个官名，便宜时收购，腾贵时卖出，平抑物价。我所翻译的《原富》内容比这要广泛得多。我认为如果为了追求通俗最好使用“理财”；如果担心定义不清，

62) 《新民丛报》第1号113~115页（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

63) 《新民丛报》第3号101~102页（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一日）。

64) 《新民丛报》第3号101~102页（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一日）。

要追求雅训，那么我所创制的“计学”还是有一日之长的⁶⁵⁾。

严复的意见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后，读者驹场红柳生（驹场为日本东京大学所在地）来信质问：从Morbotl氏开始经济学原名由Political Economy转变为Economics，日本人译为“经济学”。表面上看，“经济”好像与“政治”相混淆，但是“经”字含有政治的意义，“济”字有流通的意义，二字与这门学问非常相符。日本当时选定这个术语时也是经过了认真考虑的。《新民丛报》第3号上提议改译为“平准学”，确实如严复所说，“平准”只是一个官名，不足以表达这门学问的含义。但是，严复认为自己所创的“计学”极为雅训，可以用于各种情况，这是不是“自许之太过”？Statistics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日本人译为“统计学”，又称“计学”。如果按照严复的意见使用“计学”来翻译Economics，那么今后翻译Statistics时用什么译名呢？《新民丛报》第7号提议使用“生计学”，“生计”二字虽然比严复的译名稍好，但是还是范围太小，不能把政治理财的意义包括进去。西方的新知识中国自古以来不存在的有很多，如果都要使用古典中的名词一是不可能，二是意义不一定相吻合。现在我国处于接受西方新知识的草创期，国家对译名还没有同一的规定，加上知识分子喜好标新立异，造成了很多误解。以其让后代笑话，不如暂时使用“经济学”，等待更合适的译名的出现时再更换，或者使用日本的“财政学”。这个名称涵盖了Economics的宗旨，定义也清楚⁶⁶⁾。

梁启超对驹场红柳生的做了长篇回应。梁首先承认“平准”不适当，宣布放弃。“计学”与Statistics相混，而且是单音节名词，使用不便。例如日本的“经济问题、经济世界、经济革命”等都无法改为“计问题、计世界、计革命”等。梁启超说就译词的音节数问题曾取信询问严复还没有得到回复。梁赞同西方的新知识无法一一用中国固有词语去翻译的意见，但是他说“惟经济二字，袭用日本，终觉不安。以此名中国太通行，易混学者之目。而谓其确切当於西文原义，鄙意究未敢附和也”。“日本所译诸学之名，多可仍用。惟经济学社会学二者，窃以为必当更求新名”。对于驹场红柳生选用“财政”的建议，梁说“财政者不过经济学之一部分耳。指财政为经济，无异指朝廷为国家”，因此“财政学决不可用”。对于严复“如果为了追求通俗最好使用理财”的主张，梁启超说“专用名词，万不可以动词冠其上。若用理财，则其於用之於复杂名词时，窒碍亦滋多矣”。梁启超最后的结论是暂用“生计”，“以待后贤”。

从梁启超的回应我们知道梁曾给严复去信讨论译名问题，此信不存，但是我们可以揣测信中梁举佛经翻译的例子，主张译词应该多用二字，这样便于构成复合词，当然，更主要的理由应该是描写的更精细。

严复的回信摘要登载在《新民丛报》第12期（1902年，壬寅三月）上。严复说，译名不必拘泥“单字双字”，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处理。例如Economics，有时作名词用，有时作形容词用，不一定非译“计学”不可。“化学”有时可以译成“物质”，“几何”有时可以译成“形学”是同样的道理。“计学”可以，或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译成“财政、食货、国计”等，只要能表达意义就行。“中国九流，有以一字称家，有以二字称家”，也没听说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所以Economic Laws可称“计学公例”，Economic Problems可称“食货问题”，Economic Revolution可称“货殖变革”⁶⁷⁾。

作为汉语的语素需要有“伸缩性”，即“经”“经济”可以表达相同的概念。这样在构成复合词时在能

65) 《新民丛报》第7号壬寅三月，109~113页（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一日）。《严复集》第3册517~518页。

66) 《新民丛报》第8号（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

67) 《新民丛报》第12号62~64页（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严复集》第3册518页。

运用自如：“经改”“经济改革”。而“计学”的“学”是类名词（或称新词缀），对复合词的词义有影响，如“计学改革”是计学这门学问本身的改革，还是所研究的社会现象的改革并不确定。而严复的“计学”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译成“财政、食货、国计”的辩解只能造成一事多名，一名多译的后果，徒增混乱，是必需防止的。

其后，无锡的孙开圻来信建议使用“国计学”。对此，梁启超回应说，经济不仅仅属于国家，如果用“国计”，那么“个人经济”“家庭经济”等说法就都不成立了⁶⁸⁾。

这是汉字的一个特点，即旧的字义总是附着在汉字上，不易除去。英语的原词有“家”的意思，但是这不影响用这个词谈论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而用“国计”谈论个人、家庭的财产，中国人则会感到有不合逻辑的地方。

至此关于关于经济学译名的讨论告一段落。1910年严复在学部编订名词馆主持科技术语的审定工作，“计学”被审定为标准学术用语⁶⁹⁾，但是最终还是被日本译名“经济”所取代了。但是从“计学”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译名创制首先考虑了在意义的范围和深度上是否与原词相符？第二能否成为适当的二次构词成分？第二点明显地受到了日语的影响。

梁启超对于“计学”的评论是以夹注形式出现的，并非直截了当，足见他对《原富》的其他译名还是认可的。但是对文体批评则尖锐得多。

严氏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善更何待言。但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

就是说梁启超认为严复的《原富》的翻译，在译名的层次上问题不大，而“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效先秦”的文体却成了一般读者从严译中顺利获取新知识的主要障碍⁷⁰⁾。这种来自读者视角的担心，吴汝纶也曾表达过。梁的批评集中在严复的文体上，解决方法是使用“流畅锐达”的文章。对于梁的批评严复做了认真的反驳：“仆之於文，非务渊雅也”。就是说自己并没有“刻意摹仿先秦文体”的意图。对于针对文体的批评，严复在其他的信中抱怨说：“昨晤汪、杨二君，皆极口赞许笔墨之佳，然于书中妙义实未领略，而皆有怪我示人以难之意。天乎冤哉！仆下笔时，求浅、求显、求明、求顺之不暇，何敢一毫好作高古之意耶？又可怪者，于拙作既病其难矣，与言同事诸人后日有作，当不外文从字顺，彼则又病其笔墨其不文”⁷¹⁾。译文古雅则被责难为“示人以难”“好作高古”，写得“文从字顺”又被讥为“笔墨其不文”，简直是无所适从。在另一封信中严复则说：“《丛报》于拙作《原富》颇有微辞，然其佩其语；又于计学、名学

68) 《新民丛报》第11号89~90页（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一）。

69) 沈国威《“官话”（1916）及其译词——以“新词”“部定词”为中心》，《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3号，2008年。

70) 严译之难读、难懂在当时就已是事实。例如，夏曾佑说：“《原富》前日全书出版，昨已卖罄，然解者绝少，不过案头置一编以立懂于新学场也”。《严复集》第5册1574页。对大多数人来说严译不是知识的传媒而只是一种文化符号。

71) 《严复集》第3册535页。

诸名义皆不阿附，顾言者日久当自知吾说之无以易耳。其谓仆于文字刻意求古，亦未尽当；文无难易，惟其是，此语所当共知也”⁷²⁾。文章之所以难读是因为原著的内容深奥，责任并不在译者。严复说，“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idea＝概念——笔者注）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文体需要保持一定的品味，一味迎合不学无术的人，只是糟蹋文章。严复说译书都是在为“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但是由于翻译的内容、专业等不同，自然会有难易之别。“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对于梁启超的“文体变化与时代之文明程度为比例”的说法，严复认为中国学术“战国隋唐为达于全盛而放大光明之世”，应该使用这两个时代的文体。欧洲的文体发生了变化，所变化者是概念的增加和学术的进步；而“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乎古人”。

在1902年，译文的文体、译名似乎是一个“因噎废食”问题，但是，黄遵宪加入了讨论的队伍⁷³⁾。黄遵宪一边称赞严复的译文“隽永渊雅，疑出北魏人手”，同时表示对于“《新民丛报》以为文笔太高，非多读书之人，殆难索解”的指责不便发表有倾向性的意见。黄氏认为，名学是内容难，即使使用通俗的文体，也不易懂，这是“势不得不然也”。但是，《原富》如能使用通俗文体，能够读懂的人会多一些。黄承认制定译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非当事者不知其中甘苦。严复对译名希冀很高，要求译名与原文必须在所有的意义范围和深度上与原词相符。这种高标准可能不易实现。黄遵宪认为四千年前产生的中国已有的文字，用来书写其后新出现的事情已经是“不能敷用，况泰西各科学乎”？古文字的意义与现在的事物意义范围“已绝不相侔”，就不要说与西方文字相比较了。黄遵宪说“今日已为二十世纪之世界矣，东西文明两相接合。而译书一事以通彼我之怀，阐新旧之学，实为要务”。严复在引介西学上是重要的人物，发言有影响力。为此提出自己的见解，供严复参考。黄遵宪的建议分为两个部分，即译名的创制和文章形式的改革⁷⁴⁾。译名创制黄具体地提了以下几个方面：造新字、假借、附会、连语、还音、两合。

新造字即造字为词。黄将其列为第一项，似乎认为是主要方法。黄说“中国学士视此为古圣古贤专断独行之事”，其实《仓颉》只有三千多字，至《集韵》、《广韵》增加到四五万字。这些都是后来“因事而制造”的，如“僧、塔”等字。造字为新词是19世纪传教士们在化学元素命名、解剖学术语创造时使用的方法。并没有成功的保证。从以后的翻译实践看，严复似乎并不赞成造字⁷⁵⁾。如黄所说，造字在中国士子看来是“古圣古贤专断独行之事”。黄为何作此提案真意不可解。黄甚至说“荀子又言，命不喻而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吾以为欲命之而喻，诚莫如造新字。其假借诸法，皆荀子所谓曲期者也。一切新撰之字，初定之名，于初见时能包综其义，作为界说，系于小注，则人人共喻矣”。

72) 《严复集》第3册551页。这是写于1902年春的信。

73) 《严复集》第5册1571-73页。对这封信王栻注释：此据王遽常先生所藏抄件。原标题下注明：“壬寅（一九〇二）年作”月份不可考。笔者认为黄遵宪的这封信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澄清。例如黄遵宪能否在1902年说出“今日已为二十世纪之世界矣，东西文明两相接合”之类的话。

74) 关于文体，黄遵宪主要提出了一些技术上的建议，如改行、使用括号、序号、图表，加注释等。但是同时针对严复“文界无革命”的主张，明确地指出：文体是需要改革的，“如四十二章经，旧体也。自鸠摩罗什辈出，而行矣。本朝之文书，元明以后之演义，皆旧体所无也。而人人遵用之而乐观之。文字一道，至于人人遵用之乐观之足矣”。倒装语，一曰自问自答，一曰附图附表，此皆公之所已知已能也。

75) 沈国威“《官话》（1916）的译词——以新词、部定词为中心”，《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纪要》第3号2008年。

“假借”即用中国的旧字、词表示外来的新意义。

“附会、还音、两合”所讨论的是音译问题。附会的方法是选择那些没有意义但是发音相近的字“而附会之”，即给予新的外来义；还音是对那些“凡译意则遗词，译表则失里”的词采用音译；两合则是用两个汉字的合音接近外语的发音。黄遵宪所举的例子均采自佛典翻译。

黄遵宪关于“连语”的议论值得格外注意。“连语”即创造复合词，黄说：“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故不得不用连语。佛经中论德如慈悲，论学如因明，述事如唐捐，本系不相比附之字，今则沿习而用之，忘为强凑矣”。通过添加区别性语素解消“不足以喻”是采用双音节复合词的主要原因。但在当时，所谓“强凑”是较普遍的观点，如严复说⁷⁶⁾：

按宪法二字连用，古所无有。以吾国训诂言仲尼宪章文武，注家云宪章者近守具法。可知宪即是法，二字连用，于辞为赘。今日新名词，由日本稗贩而来者，每多此病。

而吴稚晖则不同意“强凑”之说，

和训之字，本用假名。动状各词，大都不用汉文。用汉文者，惟双迭之词，有如“提挈”、“经验”、“繁华”、“简单”之类耳（双迭之动状词，汉人习焉不察，仅目之为掉文而已。其实有时非双用不能达意。即此可见名词固不能专用单息拉勃矣息拉勃[=音节，笔者]。而动状等词，亦未尝能止用单息拉勃也）。又日本新学词头，采用欧书者，近二十年之所增添，大都不喜译意，而用假名译音⁷⁷⁾。

吴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汉字词的双音节的演化进程。王国维也意识到了中日（实际上是严复的译词）译词创造上的重大不同之处，“日本人多用双字、其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所以“创造之语之难解、其与日本已定之语相去又几何哉”。关于双音节译词的问题，胡以鲁表达了与王相同的观点⁷⁸⁾。黄遵宪的这封信显然是在看过严复在《新民丛报》上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之后写的。严复是否有回复，如何回复都不得而知。

五、结语

《原富》以后，严复继续翻译了《群学肆言》（1903）《穆勒名学》（1903）《群己权界论》（1903）《社会通论》（1904）《法意》（1904-09）《名学浅说》（1909），翻译方法和译词上都发生了变化。因为汉语本身已经踏上了“国语”化的天演路程⁷⁹⁾，严复无法完全置身于这种变化之外。就严复后来的文章（包括译著）

76) 《严复集》第2册238页。

77) 燃（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新世纪》第101-103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473页。

78) 注20) 引沈国威论文。

79) 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第一次有意识地从发展进化的视角考察汉语的近代化过程。

而言，文体上的变化并不显著，新词的增加，尤其是日本借词的采用是引人注目的。

黄遵宪称严复是学界的“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实众人之所归望者也”，对严复的影响力寄予极高的期待。1909年严复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这是他在译名方面施展抱负的绝好机会，他也确实做了极大的努力⁸⁰⁾。1911年清王朝灭亡，名词馆烟消云散，严复将审定好的术语交给在海关任职的德国人赫美玲便匆匆去天津避难了。赫美玲把严复审定的术语作为学部审定的标准科学用语收入了自己编纂的英汉辞典《官话》(1916)中。但是，收入《官话》的部定词终究没能逃脱被淘汰的命运。

无论是文体也好，译名也好，时代所呼唤的新“国语”走上了一条与严译背道而驰的路。今天我们探讨这段历史时，严复及其一系列译著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值，它引导我们从相反的角度审视新国语诞生的过程。

80) 沈国威“《官话》(1916)的译词——以新词、部定词为中心”，《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纪要》第3号2008年。

赫胥黎的主要术语及其早期汉译一览*：

原词	《华英音韵字典集成》1903	《官话》1916	今译
evolution	展开	(Bio) 天演x、进化x	进化
ethics	伦常之道、修德之理	道义学、是非学x、伦理学b	伦理
prolegomena	序、小引、序词、序文	序词	导言
nature	本性的、天然的、自然	天然物b、天地万物、自然	自然
vegetation	草木	植物、草木	植被
animal	生物、生灵、禽兽、走兽	动物x	动物
plant	草木、植物	植物x、草木	植物
glacial epoch	Φ	冰川期b	冰川期
history	史、史记、录、志、纲鉴	史、史记、历史	历史
civilized	教化过、通物理的、识礼法的	文明、文化	文明的
universe	宇宙、天地、乾坤、六合	宇宙、六合	宇宙
time	时、时候、光阴	时、光阴、时间	时间
chalk	火石粉、白灰	白石粉b、白垩b	白垩
proposition	提出之意、陈说之事	言、词、辞b、表句x	命题
philosopher	士子、穷理之士	哲学家x、穷理之士	哲学家
phenomenon	象	现象b	现象
concept	意见、意念	意想、(Logic) 概念b	概念
science	学、智、知、理	学b、科学x、理学、学术	科学
knowledge	见识、知识、智	知晓、知识	知识
space	地方、间、有界之形	地实x、空界、空间	空间
hypothesis	设想的话、设使之词	设端、设辞、假说、设事b	假设
idea	意思、念头、心思、想象	意思、意想、观念b	观念
energy	力、势力	功权b、工力x、势用x	能量
cosmic magma	Φ cosmism 宇宙论	Φ	宇宙岩浆
logic	思之理、理论之学、理学	名学x、辨学b、思理学x	逻辑
nourishment	养生之物、补血气之物	养生物、养育品x	营养
possibility	可能者、能做者	可能性x、能有	可能性
colony	新埠、属地、新疆	殖民地b	殖民地
colonisation	闢新地、开新埠	开新地、殖民x	殖民地化
colonist	属地之人、属国的人	属地的人、殖民x、殖民地人b	殖民者
savage	野人、生番、夷人、蛮子	野、草昧b、野蛮、未开化的	野蛮人
civilized man	Φ	Φ	文明人
power	力量、权势	能b、能力、权力b、力	能力、权力
intelligence	聪明、睿智	知性b、智能	智力
law	律例、法度、规条、国法	法律、法纪	法律
hygiene	保身学	保身学x、卫生学b、健全学x	卫生
civilization	教化、感化	教化、文明、文明程度b	文明
society	会、结社	社会b、人群、会、会社x	社会
community	大众、众人	公众、公团b、社会x	社会（社团）
political	政的	政府的、政治的	政治的
principle	原本、原由	原本、起点x、原理、主义	原则
capitalist	财东、富翁、财主	资本家x、资本主、财东、资本主	资本家
member	会友	同会、会友、社友、会员	成员
citizen	邑人、城中人、居民	城里人、入籍民、市民、国民、邦人b	公民

reason	缘故、原由、道理	理由、论辩b、理性	理由、理性
social organization	Φ	Φ	社会组织
communism (-tic)	大公之道、通用百物之道	共产主义x	共产主义的
duty	本分、职分、责任	勤务、本分、义务b、职分、职务b	职责、义务
right	权	直、是b、权利b、民直b	权利
consciousness	自知者、明知之事	觉b、意识	意识
ethical philosophy	Φ	Φ	伦理哲学
motive	意思、缘故、起见、本心	感动机x、动机b	动机
experience	经练、试练、历练	经验b、经过、经历	经验
reflection	反、回；思想	熟思、内省、思想、反省b	思想
perfection	成、全、完全	全美、完全b	完善化
duration	长久、恒久	久度x、长短期、时候、时期	持久性
variety	多样、多般	样式夥多、多般	多样化
exactness	合宜、详细、精细	准确、精密x	准确性
sympathy	同情、同受、性情和合	同情b、交感	同情心
anti-social	Φ	Φ	反社会
relation	属、关、干涉	关系、连属、相关。关联	关系
importance	紧要、关系、相干	重要、要紧	重要性
personality	为人	人格、人格性x	人格
personify	以为人	是某某的化身	人格化
progress	前行、进前、上进、前进	进行、上进、有进步	进步
improvement	进善、进益、修善	进步	进步
criminal law	刑律、典刑	Φ	刑法
hereditary	世袭、荫袭	遗传的、世袭的	遗传性
supernaturalism	超性之道、超性之理	超乎自然、理外论x、超理论x	超自然主义
culture	种植之事	教化、文化、教育	文化
sociability	好客之心、好交之心	社交性x	社交性
anarchy	无官无君、无父无君	无君无政x	无政府
emotion	心动、感动	心感b、感觉x	感情
religion	教、教门	宗教、教派	宗教
ethical system	Φ	Φ	伦理体系
justice	公道、公义、义	公义、司法x	正义
conception	意思、意	意思、意影、概念b、通观b	概念
public	众、众人	公共、公众	公共
private	兵卒	一己	个人
tragic	悲戏的	可惨、悲惨	悲剧
atom	极微之物、微质	莫破b、元点x	原子
heredity	Φ	世传、接代、遗传、肖亲b	遗传
quietism	寂静教	寂净教、无为教	寂静主义
hothouse	热气屋、暖房	温室、养花的暖房	温室
energy	力、势力	功权b、工力x、势用x	能量
civil history	Φ	Φ	文明史
physics	性学、性理、格物	格致学、物理学b	物理学
chemistry	炼法、炼物之理	化学b、质学x	化学
metaphysical	理学的、万有理之学的	形而上学的	形而上学的
idealist	意想教者、唯心论者	理想家x	唯心论者

fancy	幻想、空想	想象力 x、幻想、空想	幻觉、幻想
evolutionist	Φ	Φ	进化论者
agnosticism	Φ	非现象不认之学派 x	不可知论
a priori	最先	先事 b	先验的
sentimentalism	情事、触情之事	情说 x	感伤主义
pessimism	Φ	Φ	悲观主义
optimism	最佳世之道、以万物益人之教	万物皆善说 x、乐观主义 x	乐观主义
physiology	性学、性功用论	生理学 b、体功学 x	生理学
psychology	灵魂学	心灵学 x、心理学 b	心理学
revolution	变、乱、反、叛	大变、变革 b、民变、革命	革命
art	手艺、技艺、技术、工艺	Fine arts, 美术 b、美艺、雅艺 x	艺术

* 原词从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Greenwood Press, New York 1968 版) 选出。《官话》译词中的 x、b 分别为该辞典的“新词”“部定词”。Φ 为未收录词。

其他参考文献：

- 《进化论与伦理学》，同翻译组译，科学出版社，1973
 《天演论》，冯君豪注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严复文选》，牛仰山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天演论传播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动员》，王天根，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严复学术思想研究》，张志建，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

附记：关于本文的一些初步思考曾在罗马大学东方学院的研讨会（2007.9.17）上披露。承蒙顾有信、邹振环、马西尼、内田庆市诸先生惠赐意见。初稿完成后于2007年12月1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从周边看中国”上宣读。与会学者多有指教。谨致谢忱。本文包括笔者2006年度国外进修的部分研究成果。感谢笔者的工作单位关西大学提供的进修机会。